❒ 書評：*Assessing the Lee Teng-Hui Legacy in Taiwan's Politic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評價臺灣政治中的李登輝遺緒：民主鞏固與對外關係〕edited by Bruce J. Dickson and Chien-Min Chao〔布魯斯・迪克遜與趙建民（編）〕（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Hardcover, 300 pp., ISBN 0765610639）

不識廬山眞面目、遠近高低各不同*

耿　曙

國立政治大學

壹、論定李登輝？

在過往的十多個年頭裡，台灣最耀眼的一顆星星，無疑是李登輝－這位執政十二年，帶領台灣走向民主、走向自立，隻手主導台灣命運的前任總統（頁 4）。當然，即便李氏退職之後，在過去三年多中，依然動見觀瞻，任何想以 2000 年劃線，就此總結李氏影響的做法，包括本書在內（此外如張慧英所著之《李登輝，1988-2000 執政十二年》，台北：天下文化，2000），都將被證明爲稍嫌急切（編者已有同感，見頁 ix）。但對李登輝評價與反省，又屬刻不

耿　曙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所助理研究員，專長領域包括：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區域經濟以及基層政商關係等。

Shu Keng is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He specialized i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 Making Sense of Lee Teng-Hui's Numerous Legacies**

©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 Vol. 1, No. 1 / March 2004

容緩，本書於是以其治下的十二年（始於 1988 迄於 2000）爲準，就其「推動民主」與「對外政策」兩層面，進行回顧與檢討。

如同本書兩位編者所言：「李氏的作風，一再超越台灣人民的想像。在他的治理之下，台灣政治永遠風起雲湧、高潮迭起。在某種程度上，李氏好像政治的魔法師，一次又一次拋出新奇炫人的法術」（頁 13）。李氏的種種作爲，使其成爲台灣最受尊崇，也同時最遭憎恨的政治人物，但不論如何爭議，倒沒人能否認他的影響（此亦本書作者一致看法）。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李氏的所作所爲，恐將使其個人光芒，稍超過他的前任，那位恪遵乃父遺志的蔣經國總統，也似將壓倒他的後任，這位大體繼承李氏方向與格局的陳水扁總統。想深入了解台灣過往的政治動盪、今日的結構問題以及未來的可能動向，都不能不面對李登輝的巨大身影。因此，在台灣出版，以李登輝爲焦點的專著，估計超過二百卷，而論文、評論等，更屬不計其數。

縱然如此，李登輝依然是個謎，尤其對國外學者而言。根據筆者親身經驗，無論國外學者或友人，凡對台灣稍繫關切者，皆不免對李氏其人其事，抱持某些特定看法。雖有人強調其爲眞誠的民主實踐家（所謂 "Mr. Democracy" 是也），但「李氏遺緒」（the Lee Teng-Hui legacy）的評價，可曰言人人殊，實難遽予論定（按本書編者的說法，李氏「在不同的階段，對不同的對象而言，幾乎是個不同的人物」，見頁 3）。相較於島內的爭論不休，國外學者當然更不易了解李氏，然而由於其關鍵地位，若對李氏認識有限，往往難以解讀台灣各類政治現象。因此，對國外學者而言，想深入掌握台灣政治，不妨先從了解李氏起步，而就了解李登輝來說，則本書提供了最穩固的基礎。另方面，對國內學者而言，本書則收集了多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出色論述，值得相關研究者一閱。

此書脫胎自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與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西格亞洲研究中心（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共同於 2000 年 5 月間，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辦之「李登輝總統的遺緒及其對新

政府的啓示」國際研討會。其後由兩位國內外首屈一指的台灣研究專家，西格中心主任 Bruce J. Dickson（著有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Clarendon/OUP, 1997）以及時任中山所所長的趙建民教授共同編輯成書。書內包含「導言」、「李氏治下的台灣」、「台灣的政治與選舉」、以及「李氏的對外政策」等四大部份，各由二至五篇學術論文組成，集中探討李氏十二年統治期間的「民主轉型」與「外交政策」。論及本書之整體組織，層次分明，各篇論文的作者，尤多一時之選，包括國外知名的台灣研究學者如 Ramon H. Myers, Peter R. Moody, Jr. Tun-jen Cheng, Zhao Suisheng, Shelley Rigger 等，以及國內頗負盛名的學者如呂亞力、謝復生、林正義、林文程、陳樹衡、郭正亮、徐永明等。對李氏治理下的台灣，提供了一冊極深入，且深富批判精神的論文彙編。

貳、本書結構與內容

本書導言篇，著重於討論框架的設定。兩位編者先在首章中，拈出李登輝的四項基本身份／立場：台灣人子弟、偉大的改革家、堅韌的民族主義者以及兩岸關係的奠基人，並就此切入，一則解讀李氏畢生的奮鬥目標，再則評價李氏治績的得失。在參照上述架構，總結各章論述後，兩位編者認爲：李氏所遺影響，可謂正負兼備、兩面俱呈（a mixed legacy）。緊隨其後的作者 Moody，則進一步檢討李氏主導的台灣民主轉型。據其所言，台灣轉型具有四大特徵－同時也是四項危機－即強人政治、黑金政治、族群動員以及兩岸對抗等。Moody 所舉架構，經兩位編者巧妙的延伸後，亦能充作比較的架構，對照它國轉型經驗，月旦李氏的政績得失。

本書第二部份的論文中，呂亞力與馬若孟等兩篇文章，均自歷史角度切入，且均深富批判性。呂亞力在文章中，提出兩項評價李氏歷史地位的標準，其一有關「民主轉型」，但誠如所言，李氏在其統治前期（1996 年前） 頗多建

樹，然後期則多受非議。且若單就推動民主言，即便李氏成績非凡，世人仍以「中國首例民主」、「足爲對岸楷模」等視之。因此，李氏果若名垂千古，仍其在推動「台灣獨立」的功業（頁 69）。但就此而言，李氏又不如民進黨諸君，敢於公開實踐其主張（參考馬若孟等文，頁 87）。其次，與呂文類似，馬若孟等的大作，全面回顧李氏治下的種種得失。其中前人所未言者，在於所論李氏的獨斷風格，並自此出發，申論李氏何以在其後修憲、黑金、兩岸、接班等層面，涉入種種紛爭。就此而言，馬文與呂文遙相呼應，但又能深一層解讀李氏之困境－關鍵乃潛藏於其個性之中。之後陳樹衡的論文，概覽 1990 年代的台灣經濟形勢，雖簡潔清楚，卻由於未深入政策細節，無法將此文所述，與李登輝其人相互連綴。

本書的第三部份，率皆言之有物，然亦均存在類似問題。即以謝復生的論文爲例，其深入剖析台灣政黨競爭的基礎、政治參與及族群區隔的關聯、以及國民黨的發展前景等，雖值得細讀，但嚴格說來，似未扣緊「評價李氏遺緒」此一主題。與之類似者，乃鄭敦仁與徐永明之論文。該文就台灣 2000 年大選的經驗，檢討一些選舉研究的議題，例如族群影響、策略投票、三黨競爭、選區制度及上述因素間的相互關係等，雖頗具理論意義，但文章前後，總不見李氏這位主角。此類問題，Rigger 所著更形突出，李氏不但並非主角，且遭陳水扁與民進黨取代，成爲該文關注的焦點。本篇之組織編排，稍嫌鬆散，可謂全書一大缺憾。

本書的末篇，進一步將觀察評價的觸角，延伸李氏的外交與兩岸政策。就此而言，三篇論文雖自不同角度切入，卻取得類似結論。首先，趙建民分析了李氏「務實外交」的由來，及其如何在國際困境中，取得非凡成就。但另方面，由於李氏未能善理兩岸關係，使得一則國際空間越拓展，兩岸關係越緊張，收之桑隅，卻失之東隅，未必值得。再則，在對岸強烈的杯葛下，「務實外交」確實也存在相當侷限。換言之，李氏施政的罩門，仍在兩岸關係，此亦郭正亮的論點。在郭文中，作者極銳利的批評李氏，認爲其兩岸政策的前提，

多屬一廂情願，結果不免淪爲「苦撐待變」，兩岸徒然僵持、虛耗，台灣因而錯失主動出擊，以「經貿交流」換取對岸「政治妥協」的時機。反觀對岸，根據趙穗生所見，由於無以因應李氏內－外的雙重挑戰（「台灣自主」－「務實外交」），結果只能消極的武力恫嚇，深陷被動困境中，全無積極促統的著力良策，兩岸因而持續「冷戰」。如此的僵局，起碼將延續至陳水扁總統首任結束，或許亦可視爲「李登輝遺緒」的一部份吧。

最後的兩篇文章中，Bruce J. Dickson的大作，延續上述話題，深入分析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Dickson氏一面論及美國國內立場的「分歧」，使得李氏能順利操作，達成其政治外交之目的（例如1995年的訪美行程）。另方面，Dickson又述及美方利益的「一致」，強調其未必與台灣立場重疊，若一味將美國捲入兩岸對抗，美方終將視其爲「闖禍專家」（trouble-maker，例如「兩國論」風波後的李氏）。就此而言，李氏任內以「國內動員」衝撞「國際局限」的做法，不但爲其後任，也爲超然的美方，留下難解的問題。此外，林正義、林文程兩位，則全面而深刻的檢視李氏治下的國防政策與安全環境。根據兩位作者的看法，李氏任內，不斷積極推動國防體系的現代化，且於軍隊的「國家化」、「專業化」貢獻良多，值得予以肯定。但此類政策，是否將促成兩岸軍備競賽？是否又能有效增強我方士氣？卻仍不無疑問。而李氏對於軍隊中立、文人治軍等改革，均未克盡其功。因此，就李氏的國防改革而言，依然存在部份不足。

參、本書衍生的問題

本書所輯論文，基本針對「李氏遺緒」的評價展開，但在此過程中，卻衍生出數項理論議題，依作者所見，其中值得稍加探討者，起碼有下列三項。其一涉及「目的與手段」問題，主要爭議在於「民主」是否可以不符民主原則的手段去推動建構？此乃李氏所受批評之一端－其往往以「政治強人」的身份，

便宜的手法（例如族群分劃的訴求、修憲、廢省來解決政治對手郝、宋之類），推動其所謂「民主轉型」（參見本書呂亞力、馬若孟兩文）。贊成「目的辯正手段」者，往往主張：證諸中外史蹟，處於專制未滅、民主未樹之際，爲能確保民主的進程，往往必須使出非常手段，本難盡符民主的標準。而反對「目的辯正手段」者則認爲：此種推動民主的手段，不僅容易淪爲獨裁的藉口，且最終往往有害於民主宏規的確立（並無法獲致西方的liberal democracy，頁74）。無論如何，李氏推動民主化的種種努力，似乎仍將受到持續的檢視與批判。

其次爲「民主與族群」的關係，爭議在於兩者間的配搭與矛盾。誠如吾人所知，民主化的歷程，往往伴隨「認同社群」的撕裂與重組。就台灣經驗而言，「族群認同」固曾爲觸發民主轉型的主要力量，但隨著民主體制的逐步鞏固，「認同社群」亦隨之緩步重構（例如認同「生命共同體」、「中華民國在台灣」等漸多，而贊成急獨急統、單純「中國人」者日益減少）。自今而後，族群議題是否仍應作爲社會區別的疆界，似乎值得反復省思。論者對此亦有不同立場，或認爲其乃無可避免，既然社會仍然凸出此類分劃標準，則難免政治人物之刻意利用。但亦有看法，認爲此類「根深蒂固」（primordialist）的情結，既深涉感情，恐妥協不易，應隨民主轉型而逐步退出舞台。否則一旦爲有心政客所濫用，反將成爲戕害民主之最佳利器。就此而言，政治人物之訴諸族群認同，似應受特別嚴苛之檢視與批判。

最後爲「國家的自主」與「國家間的對抗」問題，其背景當然係兩岸情勢。對台灣而言，固須推動「務實外交」，突破中共封鎖，打開國際空間，但在走出路子之後，如何仍能在兩岸間，維持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協，「鬥而不破」，不致走向極端，觸怒於對岸，失信於美方，釀成臺海危機，此乃政治運作之關鍵。此亦李氏治理前期（1996年之前），外交屢見突破，卻仍能維持臺海安定，因而遠勝其次任的原因。換言之，敵對雙方之間，往往保持相當微妙的「競爭－妥協」關係。如何維持平衡，不趨極端，實有賴決策者的政治智

慧。若就 1995 至 1996 年的兩岸危機觀察，一方面江澤民確實缺乏掌握全局的能力，另方面李登輝則明顯懷抱玉石俱焚的武士精神。就內部鬥爭而言，李氏此種「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精神，固然常使其立於不拜之地，然而此種態度，若運用於兩岸關係，是否爲小國台灣之福，則乃另一項李氏必須面對的質疑與批判。

誠如前文所述，本書確屬不可多得之佳構。但作者亦願略舉數項針砭，以爲日後編輯類似著作之參考。其一，本書仍有部份文章，並未緊扣所謂「評價李氏遺緒」問題。其次，書中所集論文，雖有相當分工，卻多彼此獨立，缺乏內在的對話或論辯。所議論的主題，甚有部份重複（例如 Moody，呂亞力、與馬若孟等三文，及其後檢討外交政策的數篇論文）。其三，誠如副題所示，本書專注政治面議題，但如各篇論文所述，經濟社會面的黑金問題（散見各章）、社會運動（頁 55-58）、福利分配（頁 104-5）、乃至經濟表現（頁 92-3）等，莫不影響李氏治績，難以與政治層面截然劃分。因此，本書若有續編或二版機會，似可考慮進而將該類議題納入。最後，本書缺乏比較面向。但唯有自「比較民主轉型」的角度，方能深入探討李氏治下的成就與失誤，還李氏治績一個較合理的評價。本書中 Moody 雖曾略及於此，仍遠嫌不足。凡此皆盼日後能予增訂改進。